

臺灣社會學刊 第32期
2004年6月 頁215-222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32, June 2004

書 評

葉啓政，〈社會學和本土化〉

2001年，台北：巨流

蔡明璋

蔡明璋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Ming-Chang 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這本書是討論台灣社會學者作為一般社會成員、知識份子、科學研究者幾種角色時的規範與困境，葉啓政教授長期以來深刻地反省、批判台灣學術體系在知識生產、權力建構與利益分配的制度正當性。這本書提供給所有學界人士集體自我反省的理論基礎。

這本書的前半部討論社會學者的角色和社會學在台灣發展的歷史，包括四篇在較早期（1992-96）發表的論文，對社會學作為一種專業知識，以及社會學者作為科學家的身份，有深入的刻畫，特別是學者作為一種職業角色所應恪守的專業倫理，這是任何一位進入學術殿堂任職的教授們，必須誠心閱讀的（本書第一章）。學界知識份子理應信守規範，以熱誠、奉獻與謙沖等價值作為行動準則。知識份子不但是一種中立的知識階級，同時也是自我規訓意識強烈、謹守責任倫理的實踐者。知識令人傲慢，知識份子亦會墮落，虛偽的假借學術之名，實則作為政治建制的附庸，這些做為更當引以為戒。在當下的台灣學界，這些理想曲高和寡。也不幸言中許多學界人士。

社會學者，以及其他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並非是先知，為台灣社會提供正確的訓令或啓示。在葉啓政的反省觀點中，他／她們只是澄清社會事實的錯綜複雜，提供給社會成員各種行動選擇的可能結果，他／她們不是「最終選擇」的決定者，他只是這些選擇（如果有的話）的解釋者。葉教授直接的警示知識份子最應避免的陷阱是「知識的傲慢」。但是，在這種傲慢情緒的背後，台灣的知識份子卻隱藏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情緒表現，一種「知識的自卑」。前一種情緒的互動情境是知識份子對一般人，而後一種情緒牽涉到更複雜的互動，亦即本地的知識份子所構成的學術社群與西方學界的關係。這種關係的討論，引導我們到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對「本土化」的討論。由於本土化的議題目前是台灣學界關心的重要議題，它也將持續的影響台灣社會科學界的研究制度，因此我

在底下用較多的篇幅加以討論。

1980年代初期，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的問題引起非常廣泛的迴響。在學界激起的波瀾幅度，不下於當時也亦同俱顛倒學界眾生的左派批判理論或依賴理論。「左傾」與「本土」似乎具有極高的選擇性親近。對世界體系的支配霸權加以反省，面對西方（特別是美國）學界不可一世的優勢的反動，在第三世界並不少見。台灣學界不是唯一一個討論這些本土化困境的社群。

葉啓政教授試圖將本土化作為一種社會行動，進行知識社會學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基於這一個理論分析的層次所獲得的結論，他進一步揭窺本土社會研究者在規範層次可以採取的理想立場。這兩個層面的意義延伸出來的反省性批判，貫穿了本書第二部分的三篇1990年代寫成的文章（分別是1994，1997與2001年）。

葉啓政試著將本土化看作是一種社會行動，在文中隱約地可以分辨出幾種「理念型」，我在此清楚的標示出來，以方便底下的討論。第一種是義和團式的本土化。這是一種盲目的「揚土排外」，「排斥外來學術」的激進立場（p.130）。葉啓政以義和團為喻，斥責這種反本土化的做法，在洋槍大砲面前畫符做法護身，自取其辱，自尋死路。這條「罔顧現實、行不通的」道路（p.190），所幸學界極少人採納。在本書中，他並未舉出任何具體的例子，因此，將這種義和團式的本土研究作為一個假想的稻草人比較合適。

全書中，葉啓政所引以為憂的是全盤西化式的研究：「長期下來，我們已習慣於西方的思考與理解模式，並奉其建構出來的知識體系為正朔，學術上產生亦步亦趨的移植現象」（p.111）。同樣的，葉啓政亦未明指究竟這個學術群體為何。華人社會講究與人為善的規範，自然不必指名道姓，以免引生不必要的紛爭。在台灣，以理論經濟學研究（相對於

制度分析取向的經濟學)學者,或許接近這個類型。在社會學界,也不乏如此相同程度的西方派。從事實發現的角度來評析,這些「移植」或許可以視為是「複製」(replicate)西方學界首先發現並假設為「普遍存在」的社會事實。例如20年前曾有重製地位取得模型的研究。當然,不是所有的重製研究均是西化的想法。葉啓政教授似乎不反對這種類型的研究,以及因此可以累積的知識。他的基本假定是社會科學的事實中,「特殊與例外才是普遍的」(p.127),但是否因此意謂著「普遍才是特殊與例外的」就可以成立,也許這點要有所保留。在人類社會中,「特殊」的成分與「普遍」的成份,都是應予以重視的知識,偏一不可。

介於全盤西化派與本土派的義和團之間,存有一些較可取的「中庸」的立場與做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葉啓政亦小心地指出兩種不同理念型。第一個理念型是他所謂的「實證派的本土化」,這次他提供了具體的例子給讀者。楊國樞所提倡的「本土性契合」的論點(見〈本土心理學研究〉1997年第八期),是屬於這種類型。所謂的本土契合性,是因為源自西方之某些概念、方法,或論述內容,在運用於本土社會時,對其效度與適切度加以質疑。因此,本土化的心理學首要能扣緊本土之歷史文化特質,並尊重、順應,及聽從被研究者的本土性心理與行為。葉啓政明確的指出這種立場是一種「窄化的」本土化(p.116),因為本土化的合理性狹隘地依賴於理解工具與概念的「實用性格」與「效率判準」。知識的效用被化約成獲取客觀事實時所具有的工具銳利度。葉啓政嚴厲的批判這種工具論背後的「獨斷主義」與「霸氣的意識形態」。雖然這樣的評判有點放縱情愫的意味,這種類型的本土化研究罪不至於死。將「洋衣脫掉,換上唐裝或旗袍」(p.116)的有志之士,亦仍有帶罪立功的機會。

在全書中唯一得到葉啓政推崇的本土化典範,是費孝通的「鄉土中

國」，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長老統治」概念，據葉啓政教授的評價，能夠「很高明的掌握了中國人之實際日常生活世界的施為特徵」。一般而言，楊國樞的「本土性契合」的立場明顯的也呼應這種典範。一些本土傾向濃厚的分析概念，諸如孝道、人情、面子、緣、報等，直接或間接地受他提倡的本土心理學思維取向之影響，比起他早期的「現代性」研究，這些華人社會生活中衍生的概念，也非常接近「差序格局」那種理想型。令我好奇的是，閱讀韋伯的「中國的宗教」或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模式」論點，不也都有這種契合性嗎？雖然馬克思的契合層次，比起韋伯而言，是在制度上的結構特徵，而非心理主觀意識層次的契合。

葉啓政教授認為理想的本土化，是植基於對研究對象的身心狀態具有深層的歷史認知所建構而成的研究典範。上述這個定義或許過長，這是我試圖抓取葉啓政教授的想法所揉捏的摘要性陳述。作為一個讀者，我的直覺是，葉啓政教授對是否以清楚的語言將這種較為理想的本土化取向加以「正名」，仍然有所遲疑。或許本土化整個基業尚未成形穩固，過早的定名，可能會妨礙這個典範的憧憬，避免畫地自限或作繭自縛，在這個階段或許是必要的。在這個初始的階段，簡稱之為「歷史意識取向的本土化」或許暫時可行。相對於「本土契合性」強調的工具實效性，這種（第四種）本土化的理念型認為，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對於哲學人類學的預設應該更有清楚的呈現，能夠反映出「傳統文化基素長期的滲透」，那些「具有強烈的磁滯作用，…深嵌進人們的意識底層，支配人們日常生活世界中實際施為的細節」（p.129），可以有效的析離出來，使讀者像是讀費孝通一般，油然而生出心有戚戚焉的感覺（p.133）。理想的本土化研究，是一種認知的心態，是一種富饒人文氣息的認識論，它不是一種工具主義，也不是盲目的傳統迷思。但是這僅是就本土

化的本質加以描述。「本土契合性」，與「歷史意識取向」的本土化研究，在概念上可以分離，在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可能有非常強的選擇性親近。

上述的本土化論點，著重在類型的建構，執著於描繪特殊形式的本土化研究的根本性質。除了這種本質論的分析之外，本土化作為社會學分析的現象，還可以再從兩個特殊的分析觀點來理解：（1）本土化作為一種社會建構；（2）本土化作為一種反殖民主義的革命。

從比較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可能不足為奇。對於不同社會的了解，必然要深知在地的社會行動者的生活方式。以目前國際社會學的發展成熟度來說，很少人會反對這種本土化的研究方式。這樣的研究在國際社會學的社群中，也應很容易得到讚賞。問題是當我們低頭看自己手上擁有的本土性的分析工具時，卻發現我們幾乎兩手空空。於是，最後仍不免要再回頭在西方科學界中尋找、借用「現成的」概念，借用這些來工具來理解自己。社會網絡、強連繫、弱連繫這個家族的用詞流行在台灣學界，並不是很單純的偶然。本土社會學界或許有這麼一天能從西方優勢的學術文化中解放出來，學者們也仍會發現，在自己當家作主的時候，左支右絀，發現自己原來是缺乏歷史的。沒有這些本土的概念工具，我們如何了解自己的歷史世界？我們必須創造出來一些本土化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本土化不是原本就存在的社會事實，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過程。

本土化的另一個結構特質，是整個企圖在本質是一種故意「偏離」（deviation）西方的努力。這種解放的成功，是以和西方的距離長度（去中心化）來判斷的。這種自我審查的新體制，像是一種反殖民主義的革命（p.134）。但是，這真的是台灣的學術社群想要的嗎？面對這個嚴肅話題時，容我引用 Frantz Fanon 在 *Black Skin, White Masks*（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一段描述黑人 (或者黑人中產階級) 的話：

「黑人想要成爲白人那樣子。對黑人而言，他們的命運只有一種，那就是成爲白人。很久以前，黑人就承認白人的優越是無庸置疑的，現在，他們的努力目標是成就自己，變爲白人。」(p.228)

Fanon 說黑人的悲劇，不是因爲他的膚色，而是因爲他們被殖民奴役過。殖民造就一種弔詭的認同，只恨不生爲白人。但是，黑人永遠不能成爲白人。本土化也不會成爲與西方學界等量齊觀的成就。葉啓政教授也許會同意這個說法：台灣的學術界仍有極爲濃厚的殖民文化，一種黑人性格 (négritude)，在求得獨立，可以當家作主時，卻發現要從頭開始是那麼的困難，只好又回過頭來央求白人。

但是，學術界的社群並不完全像是殖民主義的依賴關係。取用西方社會科學所累積的知識與技術，的確使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社會學研究，得到非常明顯的助力。台灣這幾年來與西方社會科學界的往來，持續的激發出許多新的研究成果。葉啓政 (與楊國樞) 教授的論述中，也許過度執著於「歷史特殊性」的優先，而使得一些普遍性的、可以進口移用的社會學想像，未能得到更正面的評價。這兩位前輩倡議的，並非是一種絕緣體式的本土化，因爲後者極易成爲保守的反動革命。

最近台灣社會科學界正在推動的國際化，將論文發表在 SSCI 刊物上的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爲更多年輕一代的學者設定了一個可以與西方學界並駕齊驅的標準，SSCI 論文的優勢地位，對本土化研究的衝擊之大，應是葉啓政教授數年前在出版本書時沒有料想到的 (行文至此時，我收到了他最近發表在〈政大社會學報〉2003 年第三十五期的文章〈台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討論這個議題)。這個新制度不僅及於本土化的研究本身而已。而且也牽涉到極爲複雜的台灣學界內部地位與利益競爭 (本土化 vs. 非本土化，英文書寫 vs. 中文

書寫…等)。我認爲是利益與學術地位的分配制度問題，才是引起這麼多的不滿與怨懟的根本因素。

葉啓政似乎認爲本土化的實踐，可以立基於韋伯所謂的「理念的興趣上」。這種想法反映了他一貫的獨立特行的文人性格，但卻與「世俗世界」（包括國家、大學、國科會這些他所描述爲「龐大的自我指涉的體系」，p.175）格格不入。這本書可能是另一種「歷史的終結」，而葉啓政則是用力思考本土化的「最後一人」（借用福山的名言）。

作者簡介

蔡明璋，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校區社會學博士，研究興趣是發展社會學，目前的研究議題是比較非洲的低度發展，以及台灣的經濟自由化與社會分配的關係。